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学术著作

# 中国抗战大后方 出版史

主 编 ● 周 勇  
副主编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学术著作

# 中国抗战大后方 出版史

主 编：周 勇

副 主 编：陈兴芜

撰 稿：苏朝纲 王志昆 陈初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 / 苏朝纲, 王志昆, 陈初蓉撰稿.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229-09676-2

I. 中… II. ①苏… ②陈… ③王… III. 出版事业—文化史—中国—1937~1945 IV. ①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538 号

## 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

ZHONGGUO KANGZHAN DAHOUFANG CHUBAN SHI

主编 周 勇 副主编 陈兴芜


撰稿 苏朝纲 王志昆 陈初蓉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曾海龙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陈 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mailto: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40mm×1030mm 1/16 印张: 36.5 字数: 559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676-2

定价: 7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 编纂委员会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 王川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 王建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方德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巴斯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 朱汉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任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 任贵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 齐世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刘庭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 汤重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步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何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 麦金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铨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贤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本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笙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心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宗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宏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畏 别必亮 何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 总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有



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 序

王仿子

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战争,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抗日战争大后方出版史是抗日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为编撰《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在组织工作和实际工作中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力支持。他们的编撰人员还直接与我通信,交换意见。该书出版后,王益<sup>①</sup>同志说:“这为中国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

现正当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此书经修订,书名改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史》,并列入《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新书基本保持了原著风格,由于吸收了本世纪以来各地出版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并调整结构、拓宽领域,从而使内容更加全面、系统、丰富,可喜可贺!

2015年3月21日

时年99岁于北京

(王仿子,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原理事长)

<sup>①</sup> 王益,时任新闻出版署特邀顾问、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 目 录

总序 .....	章开沅 1
序 .....	王仿子 1
概述 .....	1
<b>第一章 全面抗战,抗战出版物风起云涌 .....</b>	<b>11</b>
一、武汉——抗战初期的出版中心 .....	11
二、广州——沟通海外的枢纽 .....	59
三、长沙——活跃的图书发行据点 .....	77
<b>第二章 坚持抗战,促进西南西北出版业的发展 .....</b>	<b>92</b>
一、桂林——空前繁荣的战时文化城 .....	92
二、昆明——骤然兴起的战时文化重镇 .....	133
三、战时贵阳出版业的大发展 .....	170
四、战时成都的出版业 .....	190
五、战时西安的出版业 .....	233
六、战时兰州的出版业 .....	244
七、暴起暴落的迪化出版业 .....	253
八、战时西康、青海、西藏的出版业 .....	258

<b>第三章 重庆——中国战时的出版中心</b> .....	286
一、云集重庆的出版机构 .....	287
二、战时重庆的主要期刊 .....	303
三、战时重庆的图书出版 .....	319
四、爱国义卖 献书献金 .....	387
五、抗战大后方出版业的编辑、印刷与发行 .....	394
六、艰苦卓绝、奋斗不息的大后方出版业 .....	418
七、抗战时期学术奖励 .....	431
八、关于战时书刊审查 .....	439
<b>第四章 抗战胜利复员期间的大后方出版业</b> .....	458
一、艰难的复员 .....	459
二、复员期间的书刊出版 .....	463
三、复员期间出版界的重要活动 .....	468
<b>附录一 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纪事年表</b> .....	477
<b>附录二 中国抗战大后方出版人物简介</b> .....	503
<b>后 记</b> .....	569

## 概述

中国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物,历来集中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一些沿海城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出版中心在上海。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每年出版物要占同期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一大半。据王云五的统计,1934年,三家出版3786册占全国出版6197册的61%;1935年,三家出版5752册占全国出版9223册的62.36%;1936年,三家出版6717册占全国出版9438册的71.16%。三年间三家出版物的平均数5418册则占同期全国出版物平均数8286册的65.38%<sup>①</sup>。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上,上海几家出版社的垄断程度尤高,这是和商务、中华等历史悠久,资本雄厚,可以组织权威的编审机构分不开的。据1932年的统计,商务供应全国教科书的十分之六,中华供应十分之三。正中书局在南京成立以后,也进入了教科书的供应市场,不过,在当时六大教科书供应商中排名末尾,前五家分别是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都是上海的书局。<sup>②</sup>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出版中心西移。随着战事的转进,中国政府,主要经济、文化、教育、出版机构和大批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编辑出版家,几经向内疏散和集中,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还都复员。

① 王云五:《十年来之中国出版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十年来之中国》,1937年)。

② 《正中书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进攻,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15日,蒋介石发布全国总动员令。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实现,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开始进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解放战争。

到这年底,抗战不过半年,平津早已沦陷,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当年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即有部分直属机构迁到重庆开始办公,而大多数主要职能部门,则首先向武汉集中。当时武汉实际上成了指挥中枢的领导中心。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立。12月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旋即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同时,众多的出版机构也从上海等地分别迁到武汉、广州、长沙等地。

从抗战爆发到武汉撤退,是为抗战初期。随着战局的变化,一大批文化要人、新闻出版名人,如邹韬奋、郭沫若、钱俊瑞、张仲实、全仲华、胡绳、柳亚子、杜重远、薛暮桥等相继到达武汉,一些上海、南京的出版单位也竞相迁来武汉,一时间,武昌,特别是汉口陡添了三四十家出版机构。1937年9月,正中书局营业部从上海迁到武昌,11月在汉口成立正中书局总办事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开明书店也在这年年末迁到汉口;接着张静庐主

持的上海杂志公司、顾颉刚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国民政府的独立出版社都先后迁汉。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在汉口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书籍第一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加上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大东、开明、生活等书局原有在武汉的分支机构,以及武汉本地的亚新地学社、华中图书公司、扬子江出版社、海燕出版社、战时出版社、复兴出版社、现代出版社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武汉共有出版社达63家<sup>①</sup>,武汉成为抗战初期的出版中心。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共有期刊180种<sup>②</sup>。战时武汉出版新书550种<sup>③</sup>。战时武汉出版图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有关抗战的图书众多,另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开始大量出版。

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沦陷后,广州成为沟通海外的枢纽。广州的出版业原本比较发达,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它远离战场,直到1938年10月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州及广东各地政局比较稳定,市面也比较繁荣。加上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交通、印刷条件诸方面的便利,吸引了上海、南京等地的不少出版机构、报刊、作家和出版工作者来到广州。他们大多是将他们办的报刊带到广州出版,也有在广州创办新的出版机构和报刊,如夏衍将《救亡日报》移至广州出版,并在广州创办南方出版社作为报社出版书刊的一个工作部门。由巴金主持成立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立即恢复抗战开始刊行的《烽火》周刊(后改旬刊),同时出版由靳以主编的《文丛》月刊。上海、南京一带不少著名的出版社、书局在广州开设了分支机构,如上海的上杂志公司、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公司、美华书局等等。继生活书店广州分店之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也在广州设立分店。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事变到广州失守前夕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州有出版机构71家<sup>④</sup>。出版图书161种<sup>⑤</sup>。

① 叶再生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第95页。

② 转引自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1月,第100页。

③ 《湖北出版史料》第3辑,第50页。

④ 据《广东省志·出版志》统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⑤ 据《抗日战争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统计,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印。

这一时期广州在书刊印刷方面有着比武汉、重庆等地优越的条件,一是印刷设备有一定的基础,广州是现代化铅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技术传入中国最早的一个港口;二是纸张来源比较丰富,当时广州日产50吨纸的造纸厂已建成,又可以从香港进口。因此,除为广州书刊印刷出版外,还为一些外地书刊印刷出版。比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该刊称创刊于武汉,实际上只在汉口注册,而编辑印刷工作均在广州进行。当年《新华日报》在粤港所销报纸也是将纸版航空运来广州翻印的。

在平、津、沪、宁相继沦陷之后,长沙一时成为战略要地。中共湖南省工委和以徐特立为代表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与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合作,迅速形成了团结抗战的局面,也为抗战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于是,大批文化人云集长沙,抗日的群众团体纷纷建立,抗日的报刊纷纷创办;图书出版由抗战前无一家专业出版社增至多家;发行机构更为普遍,发行范围更为广泛。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集中市区的计有专业出版社7家;兼营报刊、图书出版的社团、学校近10家;发行机构80多家;期刊80多家(不含机关刊、校刊)、报纸30多家。<sup>①</sup>

抗战初期长沙的7家专业出版社都是从上海、南京等地迁入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原拟设于长沙,曾一度派去部分编辑人员并建立了一个印刷厂,出版了“抗战小丛书”20多种,出版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还出版了该馆若干重版书。另6家迁入的是三一出版社、抗敌救亡出版社、中国战史出版社、战术出版社、正气出版社、战时出版社。它们出书不多,但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救亡的,如朱德、彭德怀等著的《抗敌的游击战术》(抗敌救亡出版社),萧劲光著的《实用游击战术》(战术出版社),梁中铭编绘的《抗敌正气画集》(正气出版社)等。当时还有一些团体和学校出版了部分图书和抗战小册子。如国立戏剧学校出版了抗战剧本8种,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了“农民抗战丛书”50多种。中国诗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诗艺丛书”9种等。

<sup>①</sup> 《抗战时期的长沙出版业》(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史志办提供)。



长沙原有《实业杂志》等期刊 10 多种。抗战爆发后,上海的《教育杂志》、《出版月刊》,南京的《中央周刊》、《防空月刊》,北平的《中国地质学会志》,武昌的《新社会》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期刊,都迁移到了长沙。抗战初期长沙新创办期刊 100 多种,如湖南全省人民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团体,分别创办了《抗敌》、《抗战》、《杀敌旬刊》、《抗战文化》、《中苏》、《湖南妇女》等机关刊物。它们一致宣传抗日救亡,报道抗战消息,探讨抗战问题。

1938 年 11 月 12 日长沙发生“文夕”大火,出版业损失惨重,出版机构有的迁往重庆、桂林,也有许多出版机构转移到湖南各县。

## 二

1938 年 10 月日军侵占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初期迁到武汉等地的主要出版机构和文化人又向重庆、桂林、昆明等地作了第二次的大转移,促进了文化相对滞后的整个西南西北大后方出版业的发展。其中,桂林、昆明两地,由于这期间出版业迅猛发展,分别被誉为“战时文化城”和“战时文化重镇”。

桂林地处广西东北部,交通方便,是中原、华东联结西南、华南的战略要地,又是通向香港和东南亚的门户。桂林是当时广西省会和新桂系军政机关的所在地。抗战前,桂林的出版业欠发达,只有省政府几个业务部门的编辑出版机构出版相关书刊,另外有 5 家民营书局,业务以销售图书文具为主,所办报刊也很少。在全面抗战开始,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定形势下,桂系一直主张抗日,它也怕日寇入侵广西。为了扼制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渗透和抵抗日军,它表示愿意和中共合作,开始实行开明政治,招贤纳士,网罗人才,以稳定广西政治,加强抗战建设事业。

中共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采取争取新桂系与其合作的政策。早在广州、武汉沦陷前周恩来就曾派了一批党员和动员一些民主人士去桂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文化活动。如王鲁彦、熊佛西在桂创办文艺杂志,戏剧家欧阳予倩担任了广西省艺术馆馆长。周恩来曾亲自向